

瘟疫与民间宗教

——以林兆恩与三一教为例

赵献海

(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嘉靖后期“倭寇”对莆田的严重破坏, 导致该地发生持续多年的瘟疫流行, 莆田大族林兆恩积极救治瘟疫、救济贫民, 从而有效地遏制了瘟疫的流行。在这一过程中, 三一学说逐渐演变为三一教。但林兆恩与政府的关系是合作和互补的, 而不是对立的。源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关于国家和社会二元对立的观点, 对于中国历史现象的解释力是有限的。

关键词: 林兆恩, 嘉靖, 莆田, 瘟疫, 三一教。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林兆恩, 字懋勋, 别号龙江, 道号子谷子, 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人。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日, 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十四日。林兆恩出身儒门世家, 世代官宦, 在十八岁时, 即嘉靖十三年(1534)考中生员。“尝慨兆恩自少年时, 能习举业, 冀得致身青云, 而显荣于世者。”¹ 显然当时林兆恩也要如其祖辈及同时代大多文人一样, 走向传统的科举入仕的人生道路。但乡试三试不第之后, 林兆恩却做了另一种人生模式的选择。在二十八岁时, 即嘉靖二十三年(1544), 乡试第三次名落孙山的林兆恩放弃举业,² 从此四处求学问道, 过着隐逸的生活。但嘉靖三十四年(1555)后, 林兆恩加入抵御“倭寇”的行列中, 并且积极救治瘟疫, 赈济灾民, 实现了由隐至显的转变。在此过程中, 林兆恩不仅扩大了自己在莆田当地的威望, 而且他的这些“义举”使其“三一”学说在莆田和福建其他地区广泛传播, 学说本身也逐渐宗教化, 演化为三一教。关于林兆恩与三一教, 学界已进行了多年的探讨, 但以往的研究多从思想史、宗教史的角度探讨林兆恩本人的思想和三一教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如容肇祖的《提倡三教合一的林兆恩》是较早讨论林兆恩与三一教的一篇论文。该文重点探讨了林兆恩三教合一的理论内核, 认为“他的三教合一的见解, 即是他要把道、释归向于儒教。”并且认为“林兆恩的思想无疑是受陆九渊、王守仁思想的影响……”其思路便主要是思想史的研究路径。³ 林国平的《林兆恩与三一教》, 是林兆恩与三一教研究的重要著作, 作者充分利用了《林子全集》、《九序内景图》等三一教原始典籍, 并且进行了实地考察, 是对林兆恩与三一教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部著作。该书重点讨论了林兆恩的“三教合一论”和“九序心法”, 而对三一教兴起的瘟疫背景却讨论相对简单。⁴ 马西沙、韩秉方所著《中国民间宗教史》专门列出一章, 重点讨论了三一教的教义。⁵ 刘晓东在学术团体向宗教团体转化的视野下, 探讨了三一学说演变为宗教性质的三一教的情况, 认为这种状况是晚明世人在激烈的科举竞争压力下, 将“立教”从“致君尧舜上”下移至民间的结果。⁶ 该文角度虽从思想史、宗教史的传统思路逐渐向社

¹ 林兆恩:《林子全集》利部《寄养斋叔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62页。

² “年二十八,三试弗售,乃弃去举子业。”《林子全集》贞部《林子行实》,第1205页。

³ 容肇祖:《提倡三教合一的林兆恩》,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

⁴ 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⁵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⁶ 刘晓东:《“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诗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

会史的角度游离，但却缺乏三一教兴起的具体社会背景的探讨。其实三一教的兴起，与嘉靖末期福建莆田地区瘟疫的流行，具有相当的关联。嘉靖末期，“倭寇”福建莆田地区的侵扰，引发了瘟疫的流行，在救治瘟疫的过程中，三一教主林兆恩发挥了相当的作用，而三一教也在莆田社会动荡忧患的社会局面下，在林兆恩救治瘟疫、救济贫民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从而对其后明清时期福建和华南其他地区的宗教信仰形式和社会结构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探讨嘉靖末期莆田瘟疫的流行，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瘟疫与民间宗教的关系，而且对于理解嘉靖以后明清时期福建和其他华南地区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寻觅了一个关键点。

一. 莆田的地理环境、瘟疫多发的历史传统和嘉靖后期瘟疫的流行

莆田地处福建东部，隶属兴化府。“东抵海岸，西抵仙游县界，广一百二十五里；南抵海岸，北抵永福县，袤一百二十里。”⁷嘉靖三十一年（1552）时，军民等户为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三口，人口数为二十六万六千七百三十。⁸

莆田背山面海，地势狭窄，气候温暖湿润，四季气温变化不明显。

莆田县连山亘其西北，大海浸其东南，地势夹阇，阳明用事。其为气候热多寒少，有霰无雪，草木常青。田二收，冬月寒暑衣服互着，或把扇。四月后梅雨郁蒸，砖块及石础皆润。五六月有雨，号之风。⁹

不仅如此，莆田多湖河、多瀑布、多洪水、多泉、多溪、多潭、多池，潮汐从三个方向进入莆田地区。时常发生的水患给莆田社会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至当地流传着莆田县原名“蒲田县”，因常常发生水患，所以更名为“莆田县”的传说¹⁰；再加上莆田多山、沟壑纵横、树木葱郁、地势狭窄。¹¹这种气候和环境条件容易诱发和流行瘟疫。包括莆田在内的福建地区形成的“竞渡”风俗有驱除瘟疫的内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莆田社会长期以来即是发生和流行瘟疫的地区。¹²而当地简陋的医疗条件却不能有效遏止瘟疫，民众多依靠巫祝驱鬼的方式治疗瘟疫。效果当然很差，“病者十八九死”。¹³瘟疫的威胁在嘉靖后期“倭寇”、兵乱侵扰莆田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更为严重。

嘉靖后期，“倭寇”开始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而在福建，莆田首当其冲，因为莆田正处陆地与海洋临界处，东南都靠海，两无遮蔽，且距“倭寇”据点很近。“登城东，望日下，黯黯一点青，为乌坵倭夷所经行处也。天清时，小琉球亦隐隐可见。”¹⁴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第一次侵犯福建，目标即是莆田地区。¹⁵在“倭患”中，包括莆田在内的兴化府受灾最重。“倭自嘉靖末抄掠浙直闽广，所屠戮不可胜数。即以吾闽论之，其陷兴化、福清、宁德诸郡县，焚杀一空，而兴化尤甚，几于洗城矣。”¹⁶

兴化一郡，所辖者惟莆田、仙游二县，共编户二百二十有余。迨倭奴入寇，屠戮殆尽，计逃窜而苟全者只可四分之一，并里籍合大约四五十里耳。¹⁷

⁷ 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二《地理·疆域·兴化府·莆田县》，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7 页。

⁸ 宫兆麟：（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五《赋役·户口》，光绪五年重刻本。

⁹ （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舆地·气候》

¹⁰ （弘治）《八闽通志》卷二《地理·郡名·兴化府·莆田县》，第 33 页。

¹¹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7 页；（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一《地理·山川·兴化府·莆田县》，第 147—152 页；卷十二《地理·潮汐·兴化府·莆田县》，第 164 页；《地理·桥梁·兴化府·莆田县》，第 249—251 页。

¹² 《五杂俎》卷二《天部二》，第 24 页。

¹³ 《五杂俎》卷六《人部二》，第 122—123 页。

¹⁴ 王世懋：《闽部疏》，中国方志丛书，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7—58 页。

¹⁵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¹⁶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8 页。

¹⁷ 林润：《愿诏堂集》第三册《备陈六事疏》，转引自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9 页。

不仅“倭寇”肆虐，而且救援之客兵也胡作非为。

顷闻人谈及嘉靖癸亥十一月，倭至兴化府，伪为官军赴救，城中开门纳之。倭遂入据有其城，逾岁方去。其惨毒不必言。其时立功大将如刘显者，即今刘綎父也。其在东南号为良弁，然御军全无纪律。兴化城逃出妇人，显军即掠夺之。即原参政王凤台者，其新继妻年少姝丽，亦为显所纳，诸大吏俱不敢诘。¹⁸

连年的战争，不仅导致社会经济的破坏，民众生活和健康条件的下降，而且直接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在如此恶化的社会环境下，瘟疫多发的历史传统，在此时期愈发变本加利。从“倭寇”第一次入侵莆田的次年，当地就开始接连发生瘟疫。“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时疫气盛行，人多病歿。”¹⁹“（嘉靖四十年）冬，倭夷迫城，疾病并臻，死者相枕，棺难遍施矣。”²⁰“（嘉靖四）十一年（1562），春，城中大疫。”²¹

至于此时期瘟疫属于现代瘟疫何种类属，由于史书缺乏对瘟疫症状的描述，一时难以判断。但与莆田同时发生瘟疫，距离莆田甚近的泉州府关于瘟疫的记载中，有一条史料颇值得注意。

四十一年（1562），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藉有阖户无一人存，市门俱闭，至无敢出。是年，德化田鼠大作，一亩之田，至有数千。春食秧，冬食谷，哇畔介然。鼠道草为不生。次年，谷贵，人多饥死。²²

嘉靖四十一年（1562）蔓延莆田、泉州的瘟疫会不会是由田鼠将鼠间鼠疫传播至人间，演为人间鼠疫呢？综合各种因素加以考察，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田鼠的突然增多，是在瘟疫发生之后，而不是之前。而且仅见有田鼠活跃的记载，却未见判断人间鼠疫的重要根据——大量鼠类在瘟疫爆发之前死亡的记载。因此，据此条资料判断此时期瘟疫是鼠疫，是缺乏足够论据的。其实，鼠类成灾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并非罕见，不一定与鼠疫有必然的联系。

从嘉靖四十年（1561）年瘟疫导致的死亡人口无法以棺葬之，可以看出当时死亡人口之多。嘉靖四十一年（1562）造成多大规模人口的死亡，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通过“夏，疫气尤重，鬼常出没”²³的恐怖气氛的描写，可以想象当时瘟疫蔓延之烈。“倭寇”、兵乱、瘟疫对莆田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死者七八，甚至有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野。故孤城之外，千里为墟，田野长草莱，市镇生荆棘。²⁴

“倭患”后，大多数民众面临的还有饥饿的威胁。如何使经过兵乱之后生活困苦的民众度过难关，增强抵抗瘟疫的能力，不仅是遏制瘟疫蔓延的根本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关系莆田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倭夷自乙卯入莆，浸淫至壬戌，已八年矣。诸乡村贫病者率散处各衙门及各寺观。而饿殍累然载道。”²⁵可以讲，此时期莆田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如果不积极加以解决，瘟疫的蔓延将是难以控制的，莆田社会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安定，也无以获得。

¹⁸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兵部·倭患》，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9页。

¹⁹ 卢文辉存稿、陈忠瑜编：《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影印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568页。

²⁰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第572页。

²¹ 金鉉、郑开极：（康熙）《福建通志》卷六十三《杂记·兴化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康熙二十三年刻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6页。

²² 《福建通志》卷六十三《杂记·泉州府》，第2676—2677页。

²³ 《林子全集》贞部《林子行实》，第一二〇八页。关于瘟疫流行的时间，《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与之略有不同，是三月而非夏季。“（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城中疫气尤甚，鬼崇每多出没。《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第573页。但瘟疫经常跨越季节而流行，二者记载略有差异，其实是叙述略微不同，并无矛盾。

²⁴ 《愿诏堂集》第三册《请恤三府疏》，转引自《林兆恩与三一教》，第109页。

²⁵ 《林子全集》贞部《林子行实》，第1210页。

二. 官府、寺院、富户的无为与林兆恩救治瘟疫、救济贫民的行为

瘟疫的流行，直接威胁着莆田社会的安定，而消除瘟疫的当务之急是掩埋尸体，净化社区环境，以减少传染源，阻断瘟疫的传播。林兆恩此时已收有门徒，便率领弟子掩埋尸体，人手不足，又鬻卖田地，雇佣民众。林氏为莆田大族，闽中八姓之一，世代官宦。²⁶林兆恩便是依靠本家族的经济力量，得以从容布置。林兆恩掩埋尸体的行为，从嘉靖三十五年(1556)便已经开始了。“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时疫气盛行，人多病歿。教主始鬻田造棺以施之。自是岁以为常。”²⁷

(嘉靖四十年)冬，倭夷迫城，疫疠并臻死者相枕，棺难遍施矣。教主作收尸歌曰：“与汝形骸一气分，数声木铎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命黄仕钦、林兆居、吴三乐等七十余人直日佣工于城之内，外，昇尸别男女，而礼瘞于太平山者二千二十有奇身。²⁸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尸骸暴于南北诸洋者尚多。又命僧云章、道士何州等十余人，收瘞约有死千余身。”²⁹

(嘉靖四十二年)倭寇既退，教主谓刘济策等曰：“城果陷矣。尔等能不忘一体夙心，而掩其遗骸乎？”于是，鬻田得金，命献策与僧法从等十八人，在莆田城内外，收尸积薪火化，瘞于南北河尾二山，约有四千余身。又瘞余骨百有余担。作寇退收尸歌曰：“与汝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³⁰

“三月，教主复以鬻田之金，命朱禹雍、文命等九人住崎头收尸，积薪火化，文以奠之。凡瘞于城外之山者八百余身，而拾余骨无论已。”³¹

嘉靖四十三年(1564)甲子，春，命许梦笔、吴梦龙、僧明珪等十人往仙游邑收尸约八百余身。先时，倭薄仙游邑，戚公剿除之，积尸弥野。至是，教主命门徒收之，既而徇诸人之请，为莆、仙等处荐拔游魂，洒清街道。³²

救治瘟疫仅仅依靠掩埋尸体，消灭传染源是不够的，更需要对感染瘟疫者进行治疗。明代国家在各地都设有管理、训练医生的“医学”机构以及发放医药的“惠民药局”，但是这些机构在明中期以后，大都名存实亡。³³即使仍发挥着一定的功用，经过一番兵乱之后，也就基本处于无效状态了。而面对莆田积尸盈野、瘟疫恣肆的局面，莆田官府却采取了逃避的方式，表现出甚为消极的态度。“郡守易公道谭新除，闻积尸盈城野，遂停车福清县，弗敢莅任。及闻先生收尸洒道，倾心悦服，入城遂造门领教。”³⁴而正如上文所述，莆田社会民间医疗资源也十分贫乏和低效。但如果任由瘟疫流行下去，对莆田社会的打击就是毁灭性的。危难之际，林兆恩凭借自己的医术，为民众治疗瘟疫。一段神化的记载反映了这一点。

夏，疫气尤重，鬼常出没。夜遇先生歌咏登东山，迺群趋而避之曰：‘三教先生来矣。’一老翁未睡闻之。既而先生过去，少顷，复相谓曰：‘到某家去。’一鬼曰：‘某人非甚恶，只好饮耳。其家穷极，饶之可也。’又一鬼曰：‘到某家去。’众以为然，遂去。次早，果群病莫起。此老乃令人谓之曰：‘可去求林先生数字即愈。’病家如言求之。先生但书曰：‘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其家咸不药而起。先生之写正气，实自此始。自是几染瘟疫者，无不藉先生以起死回生矣。³⁵

²⁶ 《林兆恩与三一教》，第1—3页。

²⁷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第568页。

²⁸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第572页。

²⁹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第574页。

³⁰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第576页。

³¹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第576页。

³²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第577页。

³³ 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³⁴ 《林子全集》贞部《林子行实》，第1211页。

³⁵ 《林子全集》贞部《林子行实》，第1208—1209页。

林兆恩后来成为三一教教主，关于他的很多记载，便渲染了许多宗教神话色彩，这一点在上引文献中林兆恩书写正气即可救治瘟疫的例子中也体现了出来。但如果拨开宗教的迷雾，从考察林兆恩长期为人治病的方式和自身学识入手，可以对林兆恩救治瘟疫的医疗方法，有一初步的判断。据林兆恩自承，所用治疗疾病方法为艮背之法。

不十年间，幸遇明师怜我而教我也。直指此心是圣，而所以与兆恩言者，一皆曰四书五经。曰：“孔孟以来，而此书乃为疏释所晦，而不明至于今矣。”若夫艮背行庭微旨，尤且諄諄为兆恩言之。及别，乃复谓兆恩曰：“汝布衣也，不有以小试之，其孰从而信之？”兆恩曰：“何以试之，而使之信之？”师曰：“试之以病，病已，而人信之。”³⁶

林兆恩云“艮背之功，以念止念之心法也。”³⁷林兆恩认为心属火，心为外界功名富贵惑，而易燃，而背属水，恰可洗之，而使心归于清静。“林子曰：‘五脏皆丽于背，心既背而水之，则心清净矣。既清净则五脏皆清净矣。’”³⁸林兆恩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艮背之法的治疗理念，也应该是深染三种学说，而非一种学说的教义。艮背之法的修炼，也体现了此一特点。“林子曰：‘初学之士，先须念三教先生四个字，孔老释迦三教先生也。孔子之时中，老子之清静，释迦之寂定，皆吾心之本体者。’”³⁹但另一方面，三一学说的宗旨却是“归儒宗孔”。“窃念兆恩不自揣分，欲以倡明心圣，及非三教，归儒宗孔，以继往哲，以易天下万世。”⁴⁰

以儒学为本，而以三纲五常为旨归，以恢复唐虞三代之治为理想。

兆恩所云三教合一者，以合今之和尚、道士而三纲之，而五常之，士之，农之，工之，商之，以与儒者为一，孔子为一也。夫孔子之道，公道也；孔子之心，公心也。……如无志于唐虞三代之治则已，如有志于唐虞三代之治，若不群释道者流，而三纲之，而五常之，士之，农之，工之，商之，其何以复还太和元气于宇宙间邪？⁴¹

儒家学说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林兆恩在自撰墓志铭中谈到其生平所奋斗的目的时说：

但生平之所孜孜汲汲，以阐明夫三教归儒宗孔之旨，与夫君臣纲常之大者，不知至死之期，果能信于天下乎否耶？又不知余死之后，而万世而下，果有能知信之者，群道释而伦属之，以归儒宗孔，以扶植此三纲乎否耶？……⁴²

而通过对艮背之法的分析，也可以发现艮背之法强调不废四业，遵循三纲而加以修炼，可以说主要贯穿的是儒家学说。

而世之为学者，率皆不知所以炼之。即有高明之士，而语之以道也，则彼必曰：‘非入山习静不可也。’……此盖道流释流之邪说有以入人之深也。抑岂知炼之以三纲，炼之以四业，乃所以消磨气质而为吾进修之一大助邪。⁴³

此为炼心之法，而炼形之法，与之同理。“或曰‘三纲四业以炼心也，敢问何以炼形。’林子曰：‘以病而去病，犹以念而止念，借假以还其真也。’关键在于心。“要而言之，惟其心尔。故心之主乎其中，神有其不定乎？神既定矣，形其有不清乎？”⁴⁴

可见，林兆恩为人疗病的艮背之法，其实是吸收儒、释、道三种学说，而形成的修炼方法。在救治瘟疫中，艮背之法即使不能起到立竿见影之效果，因此上引文献关于林兆恩救治瘟疫时手到病除的描绘，多半有些夸张。但这种修炼方法应该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而其

³⁶ 《林子全集》贞部《虚空本体》，第1116页。

³⁷ 《林子全集》元部《艮背行庭》，第114页。

³⁸ 《林子全集》元部《艮背行庭》，第113页。

³⁹ 《林子全集》元部《艮背行庭》，第114页。

⁴⁰ 《林子全集》利部《疏天文稿上·附录·其一》，第948页。

⁴¹ 《林子全集》元部《仲尼公道人心》，第54—55页。

⁴² 《林子全集》利部《明子谷子龙江子兆恩枢墓》，第892页。

⁴³ 《林子全集》元部《艮背行庭》，第115页。

⁴⁴ 《林子全集》元部《艮背行庭》，第115页。

中的心理暗示作用，对于神秘观念甚强的明代福建民众，恐怕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掩埋尸体、救治患者，是救治瘟疫最直接的方式，但要解除瘟疫对广大民众的威胁，尚须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免疫力。这便需要对贫民施以救济，增强其体质。

在发生灾荒或者兵乱时，明国家常常减免当地赋税，以济民困。但是，当时兴化府的官员不同意减免，仍按“倭患”前人口征收，民众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因人口减少和土地荒芜，却交纳同额的赋税而加重。⁴⁵莆田地区本来就贫穷，这样就更加贫穷了。“近来闽地殊亦凋耗。”⁴⁶政府救灾的另一措施是分发储备的粮食救济民众。但莆田县备荒粮仓——大有仓和平海仓都在“倭患”中被毁，⁴⁷莆田官府也便没有采取开仓放粮的措施，因此国家社会保障系统在赈济莆田灾民时，几乎没有发生作用。

在灾荒兵乱之时，一个重要的施善角色是寺院。但“倭患”后，莆田寺院却没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原因是在平灭“倭寇”的过程中，国家为了筹集军饷而向兴化等地寺院征收田租，寺院多不堪负担而败落。

嘉靖四十二年（1563），闽有兵兴，军储告匮。军门议将各寺田产，扣除迷失崩陷外，每实田十亩，扣抽六亩充饷，四亩还僧。充饷者每亩征银二钱，内除一钱四分，办纳粮差，尚银六分解司。……此僧所以告困也。田鬻寺废，比比然矣。⁴⁸

另外，通常情况下地方富有之家也会在灾荒兵乱之时煮粥济民。但经过“倭患”，莆田富有之家也损失惨重。“嘉靖末城破于倭，黄石巨家，煨尽沙砾，迄今未能尽复。”⁴⁹而且闽地富有之家似乎缺乏济贫的慈善精神。“男子之钱财，不用之济贫乏，而用之奉权贵者，多矣。”⁵⁰莆田富有之家，在“倭患”后，几乎没有济贫行为，而且在林兆恩施舍贫民粮食时，富有之家还囤积居奇，意图林兆恩粮食用完之时，高价出售。⁵¹

这样，莆田县几无济民之势力。莆田“倭患”之后，瘟疫流行，社会动荡不安，这时，又是林兆恩承担起了济民事宜。

先生或散之钱与金，或惠之米与粥；据地而寝者，或与之草荐，死而不能敛者，或与之棺木，殆无虚日。所费之资，先生三之，其弟懋协一之。诸凡建义田，与收尸赈给，咸有力焉。于是人咸自庆得生。⁵²

经过林兆恩的种种努力，莆田瘟疫流行的势头被遏制。“以故生者不病于疫，死者得安其灵。而大军之后，转为太平者，二十余载，教主斡旋造化之功，顾不伟哉！”⁵³

三. 三一教的形成

三一学说在林兆恩归隐期间，便已逐渐形成。据林兆恩自述，嘉靖三十年（1551），其便开始宣传三一学说。“辛亥之春，兆恩乃始倡明三氏。”⁵⁴并且开始招收门徒，三一学说开始主要在士人间传播。

⁴⁵（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五《赋役·户口》。

⁴⁶《五杂俎》卷四《地部二》，第73页。

⁴⁷（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三《建置·公署》。

⁴⁸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福建·兴化府志·寺租充饷缘由》，四部丛刊三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版。

⁴⁹《闽部疏》，第57页。

⁵⁰《五杂俎》卷十五《事部三》，第305页。

⁵¹《林子全集》贞部《林子行实》，第1210页。

⁵²《林子全集》贞部《林子行实》，第1210页；

⁵³《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第577页。

⁵⁴《林子全集》贞部《心圣直指》，第940页。

嘉靖三十年(1551)辛亥,教主虽倡明三教,而未授徒,黄州素与教主友善,每详察言动间,心悦诚服,乃执贽长跪,愿为弟子而受教。教主见其志意恳切,始以心法语之。而黄大本、萧应麟、黄对、林兆居、郑泳、黄阳、黄辉阳相继受业矣。

55

同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林兆恩本人也逐渐开始了由隐至显的转变。莆田学官朱衡因“爱惜先生之才”,屡召林兆恩复学。“强先生衣巾讲学,为诸生式。”林兆恩最终同意,并且在思想上开始了由“隐于山林”到“隐于学校”的转变

先生亦幡然曰:‘兆恩虽隐处六年,蒙宗师之爱,犹然名标学籍,亦诸生也。而纵情于山林,是以诸生之隐隐于山林也。今日承教,复以山人之隐隐于学校也。

56

但促使三一学说形成、成熟,并且演变为宗教形式的三一教的关键时期却是“倭寇”侵扰莆田社会的社会背景,三一教的形成和传播与林兆恩救治瘟疫、救济贫民的过程相伴随。林兆恩归隐之后,所追求的仍是“圣贤之道”,⁵⁷思想旨归仍是儒家。儒家的济世、救世进取思想使林兆恩无法彻底永远地归隐,林兆恩从山林复归学校,并不是其入世的终极,宣传学说,身体力行,拯济社会,作“天地间第一等人物”才是其最终之选择。

必求所以体之于身,得之于心,见之于行者,岂敢复为口耳之赘,徇外之学哉!惟诸生相与勉之,共作天地间第一等人物也。⁵⁸

而“倭患”对莆田社会的侵扰一方面加重了林兆恩的忧世之心,激起其以三一学说拯济社会的愿望,另一方面,林兆恩自身参与抵御“倭寇”、救治瘟疫、救济贫民的过程和成绩,恰恰增强了林兆恩传播、发扬三一学说,拯济社会的自信。嘉靖四十二年,林兆恩出版了三一教的重要典籍——《三教历代会编》,反映出林兆恩在社会动荡的局面下,反而激发了对三一学说的自信心和传播三一学说的决心,可以讲,“倭寇”造成的莆田社会动荡、瘟疫流行的忧患局面,是三一教发展史上的重要社会背景,林兆恩此时思想的变化,是三一学说发展、发挥而成庞大的三一教义体系的关键点。

六月,先生避暑于天心楼,著《三教历代会编》。时命林鸣阳编辑、黄阳考校。至十一月稿成,先生弟兆诰潜录副本藏之。越三日城陷。兆诰以绳束是集于左肘,以右手扶母,间关百死而不置,既脱出。先生喜曰:‘余尝以斯集卜斯道之兴替。今既扶而出矣,意者吾之道可终明于天下万世也。’遂鬻田而命之梓。⁵⁹

此后,从嘉靖四十二年至嘉靖四十五年,林兆恩连续创作了三一教重要的几部经典:《心圣要指》、《本体教》、《夏语》、《倡道大旨》、《原宗图说》、《圣学心要》、《玄宗大道》、《性空宗旨》、《道释人伦疏稿》、《三纲复古集》等,并且在嘉靖四十五年创制了三一教门徒所穿服装——三纲五常衣,林兆恩也以开始以“三纲先生”自居。⁶⁰从理论上,三一学说已经逐渐系统化、理论化,逐渐成熟、成型。林兆恩以“三纲先生”自居,并创制了统一服式,显示出林兆恩开始树立权威,整齐门徒的意向,三一学说也便逐渐由原先较为松散的团体向较为严格、服从权威的具有一定宗教意味的团体过渡。可以讲,此时三一团体已经具备了朝向三一教转向的理论和组织基础。而另一方面,三一学说的信仰主体也开始由以士人转向普通民众。

林兆恩以嘉靖后期“倭寇”、兵乱侵扰莆田社会为契机,掩埋尸体,净水泼街,治疗疫病之人,消灭传染源,施舍食物、医药以及各种生活日用品,帮助社区贫苦民众度过难关,

⁵⁵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第561页。

⁵⁶ 《林子全集》贞部《林子行实》,第1207页。

⁵⁷ 《林子全集》利部《答掌教王武阳先生》,第873页。

⁵⁸ 《林子全集》贞部《学贵心得》,第1065页。

⁵⁹ 《林子全集》贞部《林子行实》,第1209页。

⁶⁰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第581—582页。

遏制了瘟疫的蔓延，维护了莆田社会的稳定。而官府的态度却很消极，不仅不积极救治瘟疫，而且拒绝减少赋税，对富有之家囤积粮食、不恤民众的做法也不加干涉，有的官员甚至回避责任，国家社会保障系统在救治瘟疫，赈济贫民方面也毫无作为，基本处于无效状态。而林兆恩危难之际“舍家纾难”的行为便在遏制瘟疫蔓延，重建莆田社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维护了莆田社会的安定。其努力也赢得了民众的钦佩和支持。而三一学说也便在莆田和福建其他地区广为传播，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信奉。

兆恩以艮背法为人却病，行之多验。又别有奇术，能济人于危急之时，故从之者愈众。自士人及于僧道，著籍为弟子者，不下数千人，皆分地倡教。所过往观投拜者，倾城单里。有司约束之，亦不能止也。⁶¹

而吾闽中又有三教之术，盖起于莆中林兆恩者，以艮背之法教人治病。因稍有验，其徒从者云集，转相传授而吾郡人信之者愈众。⁶²

三一团体成分逐渐复杂起来，从以士人为主的学术团体演变为容纳社会各阶层的宗教团体，其主体构成已经是下层普通民众。三一学说适应多数信徒的结果是学说的宗教性质逐渐增强，最终由学说演化为宗教。三一教便在林兆恩救治瘟疫，救济贫民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因此，至嘉靖四十五年，三一团体已经在理论上、组织上、信仰主体上，具备了由三一学说转变为三一教的条件，而林兆恩便从三一学说的学说领袖转变为三一教的教主，成为莆田和其他地区民众信奉的宗教领袖。

结论

出身于世代官宦儒门世家的林兆恩，由于科举失利的挫折感，放弃科举，过着隐逸生活。在“倭患”、兵乱的侵扰引发了嘉靖后期莆田瘟疫的流行。林兆恩依靠本家族的经济力量，捐田置棺，率领众弟子掩埋尸体，清洒街道，并且用艮背之法，增强感染瘟疫者的体质，提高免疫力，并且积极救济贫民，保障其生活，从而不仅提高了民众的体质，有利于抵抗瘟疫的侵染，而且维护了莆田社会的稳定，从而有效地遏制了瘟疫的流行，为莆田社会的重建提供了保障。三一学说也便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理论的发挥和发展，并且得到莆田和福建其他地区民众的信奉，信仰主体实现了由士人向普通民众的转变。三一团体也便由原先较为松散的士人团体，转变为更具组织性、具有宗教性质的三一教，从而对其后明清福建和其他地区的社会信仰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林兆恩在此次瘟疫救治中能够发挥主体作用，源于当时官府和社会面对社会突发危机时的束手无策的窘状。由于明代官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十分有限，尤其在面对瘟疫这样的社会突发事件时，显得十分无效。而社会组织本身能力也很有限，再加上战乱的冲击，面对瘟疫时，也无有作为。正是在这种面对突发危机，官府和社会束手无策的紧急状态时，三一教弥补了官府和社会能力的不足，承担起解决突发危机、维护社会安定的责任，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壮大。可见三一教的产生和发展源于明代社会结构内在不足，具有相当深厚的社会背景，这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历史上，民间宗教与瘟疫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

Plague and Folk Religion: A Case Study of Lin Zhao'en and his "Three-in-One Religion (*San Yi Jiao*)"

⁶¹ 《南雷文案》卷九《林三教传》。

⁶² 《五杂俎》卷八《人部四》，第164页。《南雷文案》卷九《林三教传》，《林子全集》贞部《林子行实》，第一二一五页都有类似记载。

ZHAO Xianhai

Abstract: In the late reign of the Emperor Jiajing, Putian had been ravaged for years by plagues caused by harassments of Japanese pirates. Lin Zhao'en, the head of an influential family in Putian, tried his best to put plague under control successfully by coping with plague and relieving the poor. During that time, although he had developed his "Three-in-One Theory" gradually into "Three-in-One Religion" (*San Yi Jiao*, trinity or uniti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into one),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uthorities was not opposed but cooperative and complementary. The concept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based on Western history seems not fit historical phenomenon in China very well in this case.

Keywords: Lin Zhao'en; in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Jiajing; Putian; Plague; Three-in-One Religion

收稿日期: 2005-01-30

作者简介: 赵献海, 男, 1977年生, 河南杞县人, 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